

人猿分野辨

——和吴汝康先生商榷

周作云

(四川省金堂县龙王中学)

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猿分野和人的概念的问题,是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对人类学的发展有好处,并能使我们进一步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掌握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人类和其猿祖先分野的问题,我国人类学者是有不同的主张的,如吴汝康、安志敏和颜闾诸位先生就有争议。^[6-11]

人和其猿祖先分野的界线问题及人的概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论述,尤其是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3:149]这篇论文里,系统地、全面地、精辟地作了论证。人类学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恩格斯的这篇名著是我国人类学者都一致遵循的经典著作。吴汝康、安志敏、颜闾诸先生均是这样的。但是,吴汝康先生从恩格斯的著作中作出的答案是:“划分人和猿的界线是直立姿势而不是制造工具”;安志敏先生则认为劳动、制造工具、社会等特征才是划分人和猿的标准;颜闾先生却说:“意识到自然界的脊椎动物、和制造工具就是人。”都是以恩格斯的同一名著为依据,可是,作出的答案竟是如此的不同。看来是“各取所需”,问题就更加有趣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原始人类和其猿祖先分野的界线的,除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外,还有《导言》^[3:16]和《历史的东西》^[3:174]等。这几篇论文的观点不仅是一致的,就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有关的论述相比,也都是完全一致的,一贯的,它们相互说明,相互补充。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时,应该把它们联系起来、也只有联系起来理解,方能真正掌握劳动创造人类学说的真谛。

什么是第一批原始人类和其猿祖先分野的界线呢?是劳动。恩格斯说:“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3:153-154]动物“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3:158]恩格斯又强调说:“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3:174]“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3:20]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149]

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劳动本来是在这样一个形式上，这个形式使劳动独一无二地属于人类。……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所以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引起自然物的形式的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把它当作规律来规定他的行动的式样和方法，使他的意志从属于这个目的。”^[2:172]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在自然界上打下意志的印记”的活动。

恩格斯讲得十分清楚了，第一批原始人和其猿祖先的分野的界线是劳动，而不是其他什么。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

第一批原始人的劳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一种在智力和适应能力上都比其他猿类高得多的，而且是社会化的猿类，由于几十万年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攀援时手和足起着不同的作用，由于生长相关律的作用，“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3:149-150]“于是人就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3:18-19]所以手的专门化，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149]第一批原始人类的劳动、即在自然界打下自己意志的印记的活动就从此开始了。

这最初的工具，是天然的木棒和石块等工具呢？还是经过加工的工具？马克思告诉我们：“要劳动过程稍微有了发展”之后，才会有经过加工的工具。最初的工具只是天然的工具，如由土地这个劳动手段的原始仓库供给于人们“用来投，用来磨，用来压，用来切的石块”等。^[2:173-174]把第一批原始人类和其猿祖先分开来的劳动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正是天然工具。

从上述可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直立行走，手的专门化，就是劳动的开始；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

吴汝康先生认为，直立行走、语言、社会、意识、思维以及主观能动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顺次出现的；如果说这几者是同时出现的，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他断定：“划分人和猿的界线是直立姿势”而不是其他；并且又认为使用天然工具进行的生产劳动，是没有最原始的意识动物似的本能性的活动。^[8]

吴汝康先生认为南方古猿应该归入人的系统，是因为南方古猿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上肢从支持作用中解放了出来，四肢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两足直立行走的姿势。在体质形态上，直立姿势使前人与半直立的猿类发生了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吴汝康先生于此没有把劳动作为南方古猿的特征。简单说，就是因为南方古猿的四肢分化了，上肢解放出来了，行走时采取直立的姿势，所以把它归入人的系统。照吴先生说，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还是没有最原始的意识动物似的本能性的劳动。^[8]

第一批原始人类在平地上行走时采取直立的姿势，恩格斯指出，这就意味着手的专门

化，“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3:118-119]即是说，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是有意识的活动；而动物的活动是无意识的，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

吴汝康先生也说：“使用天然工具来获取生活资料是人类劳动的最初形式。动物只是用它们躯体的一部分来获取食物，而人类能利用他们躯体以外的天然工具来获取食物。”^[8]照吴先生的观点说，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是没有最原始的意识动物似的本能性的；即对自然界没有改造意义作用的，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意志的印记的活动；那末与蚂蚁等之以躯体的一部分为工具的生产活动又有什么区别？难道能说“躯体的四肢”和“躯体以外”就是其本质的区别么？可是，马克思曾经指出，“**现成生活资料(例如食)的采取(在这场合，人自己的身体器官是唯一的劳动手段)，劳动者首先直接占领的东西，并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手段**”。^[2:173]照吴先生的说法，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和现代猿类(如黑猩猩)用手在树上筑窝巢以避风雨，用木棒和石块抵御敌人等活动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如果仅仅是说现代猿类使用木棒和石块是偶然的，南方古猿则是经常的；那末这“偶然的”和“经常的”就是其本质的差别么？现代猿类的上述活动也是没有最原始的意识动物似的本能性的活动嘛！如果把南方古猿列入人的系统，只是因为恩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149]而撇开恩格斯还说过的另一段话：“**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3:118-119]断章取义，那是没有意义的游戏。

我们把南方古猿使用的天然木棒和石块称为工具，而不仍然叫做木棒、石块或其他什么东西，正是因为南方古猿使用这些东西的行为是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

无论是天然工具或人造的工具的使用，都有一个使用原则，劳动者必须在理解了这一原则之后方能使用。理解这一原则又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概括能力才能作到；另一方面，工具是劳动手段，“**劳动手段是一物或诸物的复合体，劳动者把它用在他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把它当作传导物，传导他的活动到对象中去。他利用某些物品的机械属性，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把它们当作发挥能力的手段，适合于他的目的而在别一些物品上面发生作用**”。^[2:173]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使用工具是有意识的行为。如果认为南方古猿使用天然木棒和石块是没有最原始的意识动物似的本能性的活动，那就是说，它使用的不是人的工具，它还不会劳动生产，还没有迈过“**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如此，把它列入人的系统，就算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的。说原始人类已经使用工具，但又否认他们有意识，这是吴汝康先生的理论中的一大矛盾，不能使他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

吴汝康先生说：“**劳动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到‘在这里，我们不要讨论到最初的动物性质的本能的劳动形式。……人类劳动尚未脱弃最初本能形式的状态，早已消失在太古时期的背景中了’**。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动物似的本能的劳动是人类的最初的劳动形态。能否把制造最原始的石器工具看作是这种最初的劳动呢？难道能说制造工具这样重大的事件还是动物似的么？难道能说制造工具还只是本能性的，

而没有最原始的意识的作用么？我认为不能。从现有的人类学资料来看，这应该是指使用天然工具来进行生产。可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还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科学资料。我认为马克思是在不讨论人类最初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推崇了弗兰克林的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着重指出人类制造工具的特点。我认为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恩格斯才提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论点的。^[18] 吴汝康先生关于人猿分野的理论的基本要点就是如此。

要辨明吴先生的理论是否能够成立，我们还是从他的论据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上推崇弗兰克林的定义和提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呢？

恩格斯在论述第一批原始人类和其猿祖先的分界线时说：“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3:154]“毫无疑问，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都比其他一切猿类高得多的一种猿类那里，这种滥用资源必然造成的结果，是食料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这些材料就是这种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3:154]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人和其猿祖先的区别是劳动，而不是其他；猿祖先的无意识的掠夺经济生活虽然强有力地促进它变成人，但是，掠夺经济的活动还不是真正的劳动，还不能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作用。恩格斯未在任何地方否认使用天然工具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作用是劳动。吴汝康先生说使用天然工具的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是无意识的本能性的活动，不是真正的劳动；那末它与上述的猿类的活动有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没有本质的差别，那又是以什么为根据把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称之为“劳动”？如果有本质的差别？那差别又在何处？

恩格斯曾经特别强调说：“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的行动的能力的。”如狐和由于与人类相处而高度发展的家畜等和小孩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能做到。”^[3:157-158]难道能够否认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人就包括着第一批原始人类么？难道只有使用经过加工的工具的劳动在自然界才能打下意志的印记，而使用天然工具就不能在自然界打下意志的印记吗？只有那种否认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是有意识的行动的理论才能那样认为。恩格斯并不否认如狐和由于与人类相处而高度发展的家畜等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的行动的能力，对于从在智力上和适应能力上比其他一切猿类都高得多的猿类发展而来的第一批原始人类，难道还否认他们具有最原始的意识么？

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第一批原始人类的劳动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使用天然工具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行动。这个行动是从过了许多万年的无意识的“滥用资源”生活的猿祖先那里发展而来的。正是因为这个事实：使用天然工具的行动是有意识的；所以在劳动过程稍微有了发展之后，才会出现经过加工的工具。加工工具（即一般意义说的制造工具）要成为可能，在智力上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对即将加工成的工具的性能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能够进行抽象和概括；对用来加工成工具的材料的性能和将要加工成的工

具之间的关系能够进行抽象和概括。这个前提正是在、也只有在使用天然工具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中才能提供。原始人类最初把天然形态的石块或木棒加工成特定形态的工具(即一般意义说的制造工具)这件事情的本身,恰恰正是使用天然工具的行动是有意识的活动的确凿的明证。人类加工工具的历史比意识的历史晚得多,正如它比劳动的历史晚一样。

唐晓文在其《劳动创造了人》中说:“原始人类从能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候起,便开始有意识地生产劳动,开始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2;26]这是说,原始人类在有加工过的工具之前是没有意识的。

我们以中国猿人打制第一把石刀为例。打制这把石刀,正如唐晓文所说,中国猿人首先要采集石英或其他硅质矿物,然后把它打成一定形状的石片,并使其产生锋刃。中国猿人打制这把石刀,采取石英石等坚硬石料而不是去采集其他不坚硬的东西;打制成一定形状的石片,并使之产生锋刃,而不是打制成其他任何形状。在此之前,必然有许多次的使用一定形状的石片的劳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理解到(即抽象和概括出)这一形状的特有的性能;必然有过许多次的把石英石用来投、用来砸、用来压等的劳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理解到(即抽象和概括出)石英石等的性能;此外,必然还在劳动过程中认识到石英石等在某一情况下可以被砸成某种形状。如果在打制第一把石刀之前没有这些,石刀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此,说中国猿人从能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候起,才开始有意识地生产劳动,这说法难道合乎事实么?

劳动是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把天然的木棒和石块加工成一定形状的工具(即一般意义说的制造工具),就是在自然物上进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劳动过程稍微有了发展的结果。工具的本质特征是作为劳动者在劳动对象上适合他的目的而发挥作用的手段(传导物)。这种手段(传导物)既可以是经过加工的工具,也可以是天然形状的石块和木棒。把天然形状的石块、石片和木棒转变为劳动者在劳动对象上适合他的目的而发挥作用的手段(传导物),从广义来讲,这算不算是一个制造工具的过程?我看是应该如此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动物的本能性的活动相比,恩格斯提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也就是说,第一批原始人类的劳动是从在自然界进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开始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琢磨的石器是在蒙昧中期出现的,而不是蒙昧时代的早期;已经有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蒙昧早期的人类(幼年时代的人类)的状态,虽然在恩格斯的时代还“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14;20]在我们今天,根据现代人类学的资料,不得不承认在经过加工的工具出现之前,在蒙昧早期的人类会使用天然形状的工具,用这些工具从事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以求得生存。

马克思说:“劳动本来是在这样一个形式上,这个形式使劳动独一无二地属于人类。……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所以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引起自然物的形式的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的工具,如由土地这个劳动手段的原始仓库供给的“人用来投,用来磨,用来压,用来切的石块”;“一般地说,只要劳动过程稍微有了发展,他就会需要

有已经经过加工的劳动手段。……劳动手段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在萌芽形式上已经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它**特别是人类劳动过程的特征**，所以，**弗兰克林就把人当作‘制造工具的动物’来定义。**”（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2:172-174]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正是由于这点，劳动才是“**独一无二地属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劳动过程的特征**”是“**劳动手段的使用和创造**”，而且“**只要劳动过程稍微有了发展，他就会需要有已经经过加工的劳动手段。**”^[2:174]而动物则不然，它没有意识，劳动手段的使用和创造在它那里始终是萌芽的形式。如现代的类人猿黑猩猩能够用手做窝巢以避风雨，拿木棒和石块以抗拒敌人，但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推崇弗兰克林把人当作“制造工具的动物”来定义。马克思推崇弗兰克林的定义，并无丝毫之意否认使用天然工具的原始人类是有意识的，这是明白的。

马克思又曾在《资本论》中讨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时说：“**在这里，我们不要讨论到最初的动物性质的本能的劳动形式。劳动者现在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出卖者，在商品市场上出现。在这个状态下，人类劳动尚未脱弃最初本能形式的状态，早已消失在太古时期的背景中了。**”^[2:172]马克思说的人类最初的动物性质的本能，到底是怎样的“本能”？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他们合写的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第一批原始人类的历史关系时，在考察了生产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新需要的产生、起初是唯一社会关系的家庭、生产中的共同活动等同时存在的诸因素之后，指出：“……**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1:34-3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一批原始人类生活于社会中，他们有最原始的意识；他们和动物的区别正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们的本能，或者说他们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这样的“本能”与吴汝康先生说的那种动物的本能是大相径庭的。吴先生认为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是动物似的本能的行动，是广义的劳动；使用人造的工具的劳动才是有意识的行动，是狭义的劳动。“**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论持久战》）。根据毛主席这一教导，我认为，如果说一个是本能的行动，一个是有意识的行动，其间就有本质的不同，风马牛不相及，说不上什么广义和狭义之分。吴汝康先生既然称它们一为广义的，一为狭义的，必然要在本能和意识之间指出其共有的本质；但吴先生没有指出过；我们也找不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精神一开始就受到语言的“纠缠”，“**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34]斯大林说：“**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

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成社会……的力量之一。”“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15:35,16]恩格斯还说，分节语的产生是人类幼年时代即蒙昧早期阶段的主要成就。^[4:19-20]“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3:152]

我认为，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从第一批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起，劳动、社会、语言和意识均同时出现了，它们的历史是同样长久的。

但是，有人却因恩格斯说过这样一句话：“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就以此来否认第一批原始人类是社会化的，否认使用天然工具的原始人类是有意识的，认为他们是“形成中的人”，而不是“完全的人”。

“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这两个词是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提出的。“形成中的人”，一次是恩格斯在讨论语言的产生时说的。他说：“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3:152]事情仍然是很明白的。既然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是在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可见他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是社会化的人。恩格斯又在讲到出现人造的工具之后，人类生活发生的变化时，又提到“形成中的人”这个词。他说，由于打猎和捕鱼，人类除了吃植物食物外还吃肉类食物，“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的……的时间，因此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3:154-155]

根据恩格斯的论断，人造工具的出现，是在蒙昧中期；语言的出现是在蒙昧早期。语言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社会和语言是同时出现的。经过加工的工具的历史比社会的历史晚。^[4:21-22]“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则蒙昧早期的人类是“完全形成的人”了；使用最早的人造的工具从事打猎的蒙昧中期的人类是“形成中的人”。

恩格斯说的“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呢？恩格斯在这里是讲推动原始人类发展的各个因素的作用，并非指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先后。他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3:153,151]

恩格斯精辟地论证了劳动、语言、脑髓、感官、意识和社会等因素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人类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在人类和其猿祖

先最终分离的那时起就停止了,相反地是在继续发展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称之为“形成中的人”。由猿人发展到古人、进而新人、再到现代人,这不是个形成的过程么?虽然,人类还在继续发展,形成着,但是已经不是猿了,而是能够对自然界进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的人类,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称之为“完全形成的人”。如果说这“完全形成的人”不再发展了,那在猿人之后的古人、新人和现代人又是从哪儿来的?人类的猿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因此人类和其猿祖先最终分离的那时起,人类就生活在社会之中。

社会这个因素,给原始人类以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因之能克服没有尖牙利爪的缺点,战胜凶恶的猛兽和灾害,求得生存和发展;社会,是劳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方式,它伴随着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为了满足在劳动中、在社会中交往的需要,语言和意识均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劳动、社会、语言和意识,是以劳动为中心的一件事情的几个方面、几个因素,在人类史上是同时产生出来的;它们并不是前后相继的几个阶段,如颜闾先生说的那样;^[1]也不是由如吴汝康先生所讲的那种劳动贯串其间的先后出现的特征。^[2]手的自由化和直立行走的开始,也就是劳动的开始。因为“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第一批原始人类和其猿祖先分野的界线,是劳动,而不是其他。由于第一批原始人类会劳动,就和猿类分开了;不仅如此,原始人类在劳动中改造自然物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形成着自己,由使用天然形状的工具到会加工工具,由猿人发展到古人;由古人到新人,进而现代人,所以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今天如此发达,从根本上来讲,是手的功劳,是劳动之所赐,人类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但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唯心论却把这一切归功于脑,归功于皇帝、神仙、“天才”和“超天才”。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就是口沫四溅地大肆鼓吹“人是自然物”,“脑髓产生思想”,“头脑制造法则”,“先知先觉”、“天才”、“超天才”创造历史;更无耻的是,扬言自己的“天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散布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他们颠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准备。

根据现有科学资料,南方古猿已四肢分化,会直立行走,这是现在人类学界基本上一致公认的。再看南方古猿的脑顶骨的结构,从其猴沟的位置及猴沟和平行沟已被顶部的扩展所推开来看,这应是属于人类的特点了。^[3]虽然目前尚无更多的资料可以进一步说明南方古猿的脑的结构和机能;但根据脑的结构和机能相统一的高级神经活动原理,从上述特点可以认为,南方古猿的脑的机能起码是趋近于会使用加工过的工具的原始人类;因为脑半球的顶下叶与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密切相关。我认为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形状の木棒和石块的活动,是属于对自然界有改造意义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劳动,而不是动物性质的本能行动;把南方古猿列入人的系统是合理的。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
-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
-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

- [5]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71。
- [6] 吴汝康, 中国古生物志, 总号第 146 册, 新丁种第 11 号, 1962。
- [7] 吴汝康, 科学通报, 1963 年 7 月号, 40—46 页。
- [8] 吴汝康, 科学通报, 1964 年 8 月号, 701—705 页。
- [9] 颜闾, 科学通报, 1964 年 8 月号, 695—700 页。
- [10] 安志敏, 科学通报, 1963 年 5 月号, 35—40 页。
- [11] 安志敏, 科学通报, 1963 年 10 月号, 34—39 页。
- [12] 唐晓文, 劳动创造了人, 人民出版社, 1972。
- [13] Broom, Robert and Schepers, W. H., 1946: The South African Fossil Ape-man, *The Australopithecina Transvaal Mus., Men. 2.* pp. 138—139 (1946)。

(1973 年 5 月 5 日收到)